

C

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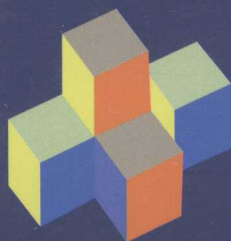
第五版

(中译本第二版)

[美]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著

阎学通 陈寒溪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014011863

D81
122-2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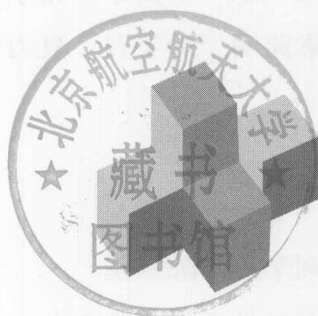
第五版

(中译本第二版)

[美]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著

阎学通 陈寒溪 等译



北航

C1698681



世界知识出版社

D81

122-2

图字: 01-2001-3108

Copyright © 2001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5版 / (美) 多尔蒂, (美)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阎学通等译. —2版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10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书名原文: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ISBN 978-7-5012-4541-3

I. ①争… II. ①多…②普…③阎…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 IV. 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7433 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陈可望
田 林

书 名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 (中译本第二版)
Zhenglunzhong de Guoji Guanxi Lilun

作 者
译 者

[美]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阎学通 陈寒溪 等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wap1934.com
010-65265923 (发行)
新华书店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87×1092毫米 1/16 54½印张
910千字
2013年10月第二版 201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541-3
8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本书译者

阎学通 陈寒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乔 木 刘志伟 刘 星

吕 杰 孙学峰 陈 华

李 青 吴 锐 周宝根

周建仁 廖 力 戴 希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道“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

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

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1991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确实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

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译者的话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的梳理和总结工作，持之以恒地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三十多年的精力。他们合著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下简称为《争论》）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材之一。该书1971年首次出版便成为许多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案头书。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社会科学研究重新走上正轨，于是一些中国学者就试图将此书译成中文，向中国传播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然而受到当时英语水平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的局限，对这本涵盖面广阔的理论汇总性著作，很多人不是望而却步就是半途而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邵文光先生终于将该书的第二版（1981年版）译成中文，并于1987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一出版就成了众多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所重视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教学的教授和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生数量都大幅增长，因此《争论》一书的市场需求也增大了。然而，第二版《争论》是二十多年前写的，已经难以适用于今日的教学与科研。为此，2001年春季我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姚东桥副总编商量，决定尽快把当年出版的第五版《争论》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自1981年第二版《争论》出版至今的二十多年里，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派大辩论的时代，而90年代则是批判理论大发展的时代。为了反映这些理论建设的新进展，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两人对《争论》一书不断进行修订，于2001年出版了

第五版。与1981年第二版相比,第五版的内容和构架有了重大变化,可谓判若两书(作者在其前言中已经有了明确说明,这里不再赘言),这些变化是我们翻译并出版此书的原因。我相信读者将能从这个新版本中获益匪浅。

为了使该书中文版早日与中国读者见面,我组织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十几名教师、博士生以及硕士生参加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使用平白的文字,防止语言西化。原文中表示强调的斜体字,在译文中都用黑体,并保留了英文。书中提供的大量注释是为了给有兴趣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读者提供查阅文献的便利,为此我们只翻译了注释中的解释性部分,其余部分则保留原文。为了方便读者使用索引,人名索引按英文名字的字母排序,主题索引按译文的汉语拼音排序。索引使用了原书的页码,原书页码标在了中译本每页的边上。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有三点体会,在此介绍给读者。首先,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阅读本书。这是一本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教授和研究生撰写的教材,限于篇幅,对各种理论只用了较少的文字做总结性的介绍,因此一目十行的方法是难以读懂这本书的,需要反复阅读才能理解。其次,需要从整体上理解术语的含义而不能望文生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过去20年中已取得了巨大发展,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理论变得更加复杂,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很多理论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该书中的专业术语范畴非常广泛,包括了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统计学、医学、心理学、神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军事学等。有些概念和术语在中文里并没有固定的对应词汇,这不但给译者,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挑战。读者需要结合上下文的内容来理解这些不同学科的专业术语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含义。第三,需要以借鉴的态度来看待各种观点不一的理论。第五版《争论》介绍了数百名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他们分属于世界上众多不同的文化与国家。但是书中所提及的中国学者多是我国的古代先贤,如孔子、墨子、孙子、商鞅等,在近现代的理论中只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被吸纳入本书。翻译本书之后,深感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身上背负的责任。先贤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我辈应该发扬光大,争取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五版《争论》的中译本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参加翻译工作的每一位教师和研究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研究生

当中，我的博士研究生陈寒溪和孙学峰校译的篇章最多，并承担了全书的体例、注释以及索引的校译和编辑工作。我要特别感谢我所军控专家李彬博士，他对第八章“威慑理论：军控与战略稳定”所做的校译确保了这一章翻译的专业水平。此外还要感谢王晓云小姐和黄志贤小姐为翻译本书所做的录入工作。

我要感谢福特基金会为翻译此书提供的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繁重的翻译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

我负责了全书每章的最后校译，力争把错误减少到最低程度。该书涵盖的知识范围非常广泛，由于本人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如有误译和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最后衷心希望第五版《争论》的中译本能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全面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发展方向有所帮助。

阎学通

2002年10月30日于清华园

再版序言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以下简称《争论》）中文版出版十周年之际，世界知识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为此向原出版社第二次购买了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出版中文简体版第二版，说明它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争论》不仅为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提供了一条捷径，而且能帮助读者纠正对理论的错误理解。我国已经出版了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综述的著作，每本都各有所长，但就对各派理论的理解的准确性和深刻性而言，《争论》一书罕有其匹。故此，我仍推荐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读者研习此书。

《争论》在以往十年没有修订，而该书的译者和读者们却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田野中继续耕耘。回首十年，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新的建树。在首版中文版《译者的话》中我曾感叹，中国学者无法像先贤一样创造出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当时，评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状况最常见的说法是“低水平重复”。翻译、介绍、综述外国国际关系理论是我国当时国际理论研究工作，本土的理论创新成果凤毛麟角。十年后的今天，虽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新还未成为主流，但已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出现了群体性成果。我的学生杨原对2008—2011年中国11种国际关系专业杂志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统计的463篇文章中，有理论创新性成果的文章为65篇，占总数的14%。^① 2012年北京大学举办的

^① 杨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2011）》，《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91页。

国际政治学博士生论坛收到40多篇会议论文,基本上都是问题研究型的文章,综述性的文章已寥寥无几。我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改变中国理论研究低水平重复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取得的创新成果,与《争论》一书的出版流传不无关系。许多青年学者和我一样,都是通过阅读《争论》这本教材,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才知道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内容,才知道国际关系理论进步的历史路径,同时也才知道理论创新是要超越这本书中所介绍的理论知识,重复《争论》中的知识不是理论创新。阅读《争论》获得的这些认识,是中国学者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基础。以《争论》介绍的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成果。应该说,不同的理论流派的中国学者都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但限于我阅读的有限,因此仅仅介绍一下我个人所熟悉的部分现实主义学者的理论创新。

(一) 权力转移理论的创新研究

《争论》介绍的权力转移理论,其核心命题是关切霸权如何维持和延续,而中国的现实主义学者关心的则是如何取代霸权的问题,他们的理论成果多是从中国如何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这些理论创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已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学者就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评论。

1. 体系要素理论。主流现实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竞争将导致国际格局的转变,从而引发国际体系的转变。然而,体系要素理论认为,国际格局单一要素变化不足以改变国际体系的类型。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要素构成的,因此仅单一的体系要素转变不等于体系转变,至少要有两个体系要素发生质变才能带来体系的类型转变。这种理论有助于纠正对“国际体系”这个概念的滥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冷战结束时的国际格局转变不是国际体系转变。该理论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崛起引发的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转移,将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带来体系转变。^①

2. 结构性矛盾理论。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国主观上具有挑

^①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战霸权国的意愿,因此崛起国不可避免地要选择挑战霸权的策略。然而,结构性矛盾理论超越了这种观点,认为即使崛起国主观上不采取挑战霸权国的策略,双方实力差距的缩小就足以在客观上形成对霸权国主导地位的 challenge,因此霸权国必然会以军事力量进行压制,这种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①美国2010年开始的重返亚太战略表明,即使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战略,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深化。

3. 崛起困境理论。该理论是对结构性矛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崛起困境理论认为,随着实力地位的上升,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从而导致它面临的体系压力也不断加大。^②这有如牛顿第三定律,即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这个理论被近两年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和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权冲突所验证。

4. 安全保护竞争理论。该理论是对崛起困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认为在崛起国与霸权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的条件下,双方战略竞争的方式从争夺领土转向国家间的利益交换,即大国为中小国家提供某种好处,特别是安全保护,以换取它们的政治支持。^③美苏在冷战时期竞争军事盟友的历史可以支持这个理论,但冷战后的历史难以支持,这种理论面临着未来十年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检验。

5. 安全委托理论。该理论是对安全保护竞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内,所有主权国家都需要安全自助,而安全委托理论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中小国家通常无力做到安全自助,他们需要大国的安全保护,因此它们将本国的安全委托给军事强国。^④这个理论不仅解释了大国竞相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的社会需求,还改进了主权国家都是安全自助国家的理论。这个理论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主权国家不是完全主权国,例如日本;还

① 阎学通:《历史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6期,第1—12页。

② 孙学峰:《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142—156页。

③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④ 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3—49页。

可以解释为何多数的大国采取安全自助原则而多数的小国采取安全委托原则。

6. 假朋友理论。传统现实主义者普遍用安全困境理论解释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和双边关系恶化。然而,安全困境理论有一个缺陷,就是解释不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为何有时能缓和与改善。假朋友理论超越了安全困境理论,可以解释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双向变化。该理论认为,“假朋友”具有性质和策略的二项性。假朋友的性质是由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安全困境决定的,因此假朋友性质使双边关系恶化,但是假朋友策略则具有暂时缓解双方的紧张甚至改善双边关系的功能。于是,假朋友关系使得双边关系起伏不定,时好时坏。^①冷战后的中美关系验证了这个理论。

(二) 国际规范理论的创新研究

《争论》一书介绍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以欧洲政治思想和欧洲历史为基础建立的。自2005年起,中国现实主义学者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创造出一些新的国际规范理论。

1. 合法崛起理论。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都将体系转换完全归结于实力变化的作用,而合法崛起理论则发展出一种政治权威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转变不仅包括实力结构而且包括体系规范。如果国际体系是从严格的等级制向松散的等级制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体系内会存在一个实力较弱但具有很强合法性的国际权威。争霸的国家都会努力利用这个国际权威为其崛起为主导国而制造合法性。这个国际权威的存在影响了大国争霸的方式。^②这个理论不但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象,也能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在进行国际武装干涉之前要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行为。

①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30页; Yan Xuetong and Qi Haixia, “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 China-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2, Summer 2012, pp.105-128.

② 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

2. 合法干涉理论。传统的国际干涉理论主要是论证干涉的功能和目的,而合法干涉理论则通过对干涉的类别划分,分析干涉合法性的基础。该理论将国际干涉分为进攻性干涉和防御性干涉两类。防御性干涉的目标是维持体系的现状,有助于防止战争或约束暴力行为,容易得到多数国家支持,因此也就具有了合法性。相反,进攻性干涉具有改变体系的功能,因此难以具有合法性。^①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何美国发动1990年的海湾战争就具有合法性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没有合法性。

3. 以身作则理论。国际规范演化机制理论是研究成果较多的理论,但有关主导国如何推动新国际规范形成的理论则只侧重于强制与推动两个路径。借鉴了中国古代有关王、霸、强的主导国分类标准,以身作则理论建立了主导国通过以身作则、惩罚、奖励三个路径推动国际规范演化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弱国效仿强国是普世的社会规律,因此主导国的自我实践是推行新型国际规范的必要条件。当主导国自身不实践某种规范时,惩罚和奖励都起不到促进该种规范国际化的作用。^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上实践的是双重标准规范,因此双重标准规范在国际上也最为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种理论。

4. 等级规范理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平等规范有利于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借鉴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社会等级有利于维护秩序的认识,等级规范理论认为,等级规范和平等规范对于维护国际秩序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等级规范适用于实力大小不等的国家间关系,而平等规范适用于实力相等的国家间关系。^③如今,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规范是对这种理论的实践支持。

5. 战略均衡理论。该理论研究者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发现,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动关系在两个纳什均衡点上可以保持稳定。中心国家对周边国家采取征讨和安抚的策略,周边国家对中心国家采取骚扰和臣服的策略,从而形成征讨—臣服和骚扰—安抚两个纳什均衡点。这是一个解释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战略关系循环变化的理论。^④它不但可以解释

① 陈琪、黄宇兴:《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33—73页。

② 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8页。

③ 阎学通:《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5—144页。

④ 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9—58页。

东亚历史,也可以解释历史上世界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现在美国与非同质国家的关系。

(三) 关于战略选择的理论

中国现实主义学者还创新了一些关于战略选择的理论,也超越了《争论》一书介绍的战略理论。不过,这些理论类似于《争论》一书中提到的“理论岛”,它们之间还缺乏相互联系的桥梁或摆渡船,我们还难以用一个主线将它们串起来。

1. 单极结盟理论。传统结盟理论普遍研究的是两极格局下的结盟行为,认为在共同安全威胁的条件下国家就会结盟以增强安全保障。单极结盟理论认为,在单极条件下,由于受霸权威胁的国家结盟也构不成有效抗衡霸权的能力,于是会出现只与霸权结盟而无反霸权结盟的现象。^①这种理论符合冷战后的国际结盟现象。

2. 小国退出同盟理论。传统的同盟理论认为,同盟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的升降与同盟解体无相关性。然而,小国退出同盟瓦解理论则认为,同盟面临的安全威胁上升到危机程度时,小国因为担心损失过大而不履行同盟义务。^②另一种解释认为,在安全威胁不上升的情况下,小国的安全自保能力提高后,它将不愿忍受同盟内部战略分歧带来的损失,这会导致这些小国退出同盟。^③这些理论可以解释为何一些独联体国家退出该组织。

3. 人技术结合理论。传统军事理论认为,当进攻性军事技术优于防御性技术时,国家会选择进攻性战略,反之则选择防御性战略。人技术结合理论则认为,军事技术本身对国家战略选择没有决定性作用,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利用即时的军事技术优势。无论是进攻性技术还是防御性技术占优势,美国历来都是选择先发制人战略,而中国战略家们却提倡后发制人战略,所谓哀兵必胜。^④2012年,中国在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和与非

① 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36—42页。

② 刘丰、董作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4—31页。

③ 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的解体》,《世界政治与经济》2013年第1期,第67—92页。

④ 徐进:《进攻崇拜:一个理论神话的破灭》,《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83—100页。